

明清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

李正爱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 明清时期, 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关系密切。通过对刻书业的生产方式与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生产流通、学术交流和通俗文学的生产消费之间关系的考察, 表明刻书业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促进了江南城市文化、学术文献资源的增长与交流传播, 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江南城市人文精神的发展。

关键词: 刻书业; 城市文化生产; 明清; 江南

中图分类号: G122; G23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2)02-0119-07

Book-engraving industry and urban cultural production of Jiangna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LI Zheng-ai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ed book-engraving industry and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cademic culture in Jiangnan citi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he book-engraving industry an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Jiangnan city culture resources, academic exchange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 book-engraving industr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production of Jiangnan city culture, promote the resource growth and communication of Jiangnan city's culture and academic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gi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ity humanistic spirit of Jiangnan at that time.

Key words: book-engraving industry; urban culture produc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y; Jiangnan

明清时期, 以文化、学术为原材料和生产对象的江南刻书业伴随着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生产的繁荣进一步兴盛。利用发达的刻书业对已有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再生产, 既是当时江南城市文化生产的重要

途径,也是适应江南城市文化消费需求的必然结果。

1 江南刻书业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兴盛,繁荣的城市经济极大地支撑和吸引着各种手工业在大城市中聚集,在数以万计的手工业行业拓展了更加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的同时,激烈的竞争也不断推动这些行业的技术提升,从而形成江南百工兴盛的景象。刻书业就是这繁荣百工里的一种。

江南的刻书业早在两宋时期就闻名全国,如杭州的刻书业,其数量、工艺与质量在当时都处于全国领先,故宋人叶梦得^{[1]116}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明清时,江南城市经济的极大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这时期全国的刻书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因而明人胡应麟^{[2]55}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北京)也,金陵也,闽阊(苏州)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粹。”除北京外,全国四大产书地三个在江南,可见其时其地刻书业的繁荣程度。从南宋活字印刷发展到明清的套印、短版和拱花等印刷技术,成熟的技术、精湛的刻印工艺和上乘的质量为江南地区刻书业的兴盛发达、领先于全国创造了优越的技术条件。

明清时期,江南刻书业呈现以官刻为主向私营坊刻为主转变的趋势,故书坊等私人刻书业极为繁荣。如明代的坊刻和私人刻本主要集中于南京、北京、杭州、苏州、湖州、常州、徽州等地,尤其是南京有90多家书坊,在全国首屈一指,苏州、常州也有几十家书坊之多^{[3]397}。蓬勃的私营刻书业使当时图书的商品化日趋显现,牟利性经营成为江南刻书业的主要运作方式,当时苏州和南京的私营刻书占到了全国出售之书的70%的庞大的数量,连非赢利的官刻、家刻也具有了明显的牟利色彩^[4]。图书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说明当时江南城市的文化消费能力越来越大,也更为依赖城市商业市场的供给。

明清时期江南的造纸业发达,是全国最主要的产纸区,这为江南刻书业的繁荣提供了就地取材的便利的物质条件。如浙江一带的造纸业极为发达,尤其衢州、常山、开化等地纸张负有盛名,其出产的纸张质量极高,产量也非常高。据《菽园杂记》^{[5]157}卷十三记载“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所产纸张的产量巨大。据康熙《常山县志》^{[6]239}记载:“(常山所造纸)名色不可枚数,凡南直隶河南等处赋罚(用纸)及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及玉山买纳。”从清初全国各地都到浙江常山一带采购大量官派用纸来看,其地纸张的年产量必然非常巨大才能满足需求。除此之外,浙江常山等地纸张在质量上的优势也使它从当时全国出产的一百多种纸品种中脱颖而出,成为明清时期全国印刷书籍大宗用纸的主要选材。故明人胡应麟^{[2]57}在论及各地印刷用纸质优劣的时候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束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束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束,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伪,品最下。”由于纸张高质量,浙江所产纸张一直都是明清宫廷御用及各部公用的贡品纸。如开化所产的“开化纸”,由于质地特殊,被清廷选作武英殿印制“殿本”的专门用纸。由此可见,江南发达的造纸业为其刻书业的繁荣提供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条件和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江南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突出的学术成就积淀了非常雄厚的城市文化资本,也为其刻书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市场。以书院教育为例,全国素以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为最盛^{[7]170},而此四处就有三者位于江南,由此对比可见江南乃全国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远胜于其他地区。教育的发达为江南社会培育了众多的人才,而各类人才多,相应的著述就多,官宦有著述,学者、文人、科学家更有著述。例如徽州,据郑惠《略谈徽州古代刻工》的统计,徽州五邑(不包括休宁)历代学者多达1852人,成书达4175种^[8]。梁启超^{[9]60}曾言:“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藪。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教育和文化的高度发达,使江南地区日益成为社会文化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中心。因此,名流辈出、大家云集、学派林立,几乎一切学术思想和社会潮流都由此滋生与扩张。

上述这些文化成果与学术研究活动既为江南城市文化生产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江南城市的思想深度,也为江南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化生产资源,使其得以持续性的发展。例如明

清时期的徽州官刻、坊刻、家刻都很兴盛,其中官刻以徽州府所刻书籍为最多,精品与名版也名列首位,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顺治年间善本《江南赋役全书》中,编号为03623的徽州地区的就占有75种、78卷。又如清代徽州官修方志数量非常惊人,现存清代前期的309种方志中,用雕版印刷的就有203种。反之,江南城市刻书业的发达,也为城市文化与学术的生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江南地区能成为现今古籍文献资料保存最多最完善的地区,与其发达的刻书业是分不开的。明人胡应麟^{[2]55-56}曾指出:“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册类书,咸会萃焉。……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籍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如果没有发达的刻书业所生产的丰富多样、数量巨大的图书文献,江南的文献储存、学术的生产与交流活动都将丧失基础。

可见,江南发达的文化、学术与刻书业,两者的关系是相得益彰的。以发达的刻书业为基础,江南的文化和学术成果既可以很快得到传播,也可以很好地实现文献资料的有效传承,以这一优越的文化资源条件为对象,其先进刻书业也必然取得辉煌的成就。而江南发达的文化和学术生产活动,则为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2 地方藏书资源的利用与城市文化的生产

江南地区私家藏书的历史风气肇端早,明清两代更是出现了众多的藏书家,私人藏书楼在明代晚期已蔚然成风,其数量之多名列全国之首。清人孙从添^{[10]12上}在《藏书纪要》中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吴晗^{[11]3-4}《两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明清浙江籍藏书家399位,在江南的有264人。著名藏书楼如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嘉兴朱彝尊曝书亭、宁波范钦天一阁、湖州陆心源皕宋楼、杭州丁丙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刘承干嘉业堂等,藏书少者也有三万卷,多者则达数十万卷。藏书楼丰富的藏书,不仅对地方的文化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也为江南刻书业的生产和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丰富的藏书是刻书业生产的极好文献底本,为图书商品的生产开发提供了条件。故对于私人藏书,尤其是藏书楼资源的利用,一直是明清时期江南刻书业开拓图书生产业务的重要方式。以丰富的著作为资源,江南刻书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由本地的藏书家、学者对其所藏的庞大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编辑,以辑佚和汇编丛书的形式重新刊刻发行。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等现有资料统计进行推算,清学者所编丛书当在2700种左右,含单书七万余种次;其中江南地区学者编的就有六百多种,含单书一万多种次^{[12]13}。如清代湖州鲍廷博父子利用其所藏图书编纂有《知不足斋丛书》,归安陆心源依据其十万卷楼的藏书编辑了影响深远的《十万卷楼丛书》和《湖州丛书》。又如钱塘丁丙、丁申兄弟的嘉惠堂,有晚清四大藏书楼之称,藏书近20万卷,丁氏依据其手中的藏书整理刻印了影响巨大的《武林掌故丛书》,使有关杭州城市的历史文献得到了系统保存与传播,极大地扩大了杭州的文化影响。其他如吴县黄丕烈编《士礼居丛书》,阳湖孙星衍编《平津馆丛书》等,莫不如是,难以胜数。

这种方式既可以保存大量的地方历史文献,又可提高许多文献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既促进了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增加了文献资源的保存,又促进了本地区文化与学术思想的传播。学者王西梅指出,清代乾嘉时期江南以黄丕烈等四大藏书家为代表的一大批私人藏书家,他们对当时太湖地区的文化发展,特别在对吴派史学的学术研究提供历史文献上所做出的贡献,丝毫不逊于西方古代的私人图书馆^[13]。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则以影刻精绝、校勘详审为乾嘉以来的学者所推崇,他这种注重影旧存真的版本学思想对古籍整理和古籍丛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深刻影响了后来《古逸丛书》和《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的影刊和影印^[14]。而且这种文献资源的整理与刻印,本身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生产与创造活动,这种活动对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尚无公共图书馆的情况下,私人藏书楼的长期收集藏书及其刻书活动是其他任何社会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而它所形成的地方文献厚积优势也成为城市文化开发建设的优势,展现着文化教育、文化研究、文化交流的层次,突显出一座城市里居民的文化修养和文明层次。同时,这种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推动城市

文学生产的发展和演变的作用。如明代杭州藏书家洪楸清平山堂刻印的《六十家小说》(今残本题作《清平山堂话本》),除保存了宋元明以来话本小说的原始面貌外,其刊印流传对明代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六十家小说》就不会有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出现和繁荣^{[15]617-618}。

第二种是书商通过各种手段挖掘和搜罗一些私人藏书家的藏书资源进行翻印或盗印。明人胡应麟就有对杭州书商为寻找和发掘有商业价值的书源而不择手段的记载。胡应麟^{[2]55}说:“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睥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从他的记述来看,杭州的书商经常用诱骗收买、偷阅猎取等方式从一些没落旧家子弟手中取得旧家深藏不传的秘籍,将之翻刻印行,变为自己牟利的新资源。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不管书商用什么手段获得这些秘籍,他们的刻印都有利于学术的推广,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学术研究与文化成果,从而无形中起到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学术基础和社会文化水平的作用。例如杭州书商陈起父子致力于唐宋诗文集的刊刻,其“诗刊欲遍唐”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明刊十行十八字本的刊本,王国维曾论定都出自陈氏之手,由此也可见,他们的书坊刻书活动对唐诗宋词的保存和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15]650-651}。

而在藏书与刻书的关系上两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刻书为藏书提供了物质基础,藏书为刻书提供物质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亦相反相成^{[16]3}。利用私人藏书进行商业化运作刻书的群体,除了上面那种纯粹牟利的一般性书商之外,社会影响力、生产规模更大的是那些兼具书商与藏书家身份的巨富。这些藏书家对于私人藏书的态度,绝不仅限于大力收购书籍典藏,而是将自己搜罗到的善本好书予以刊刻印行,积极推向市场。如明末著名的藏书大家兼刻贩书的大书商常熟人毛晋,他以刻书致富为目的,当明末社会动荡时曾变卖田产家财以自营刻书。恰如清人所言^{[17]36}:“汲古阁在虞山郊外十余里,藏书刻书皆于是。……所刻经史子集,道经释典,品类甚繁。”他一生热衷于校勘、刻书、藏书,曾筑汲古阁、双莲阁、目耕楼三所,藏书累计积至八万四千册,多有善本,可谓既多且精。他以收藏善本珍本书校勘后刻之,扩大了图书市场供给,对江南文化学术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又如藏书巨丰的扬州藏书家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吴学勉、黄晟兄弟等人,都曾大量地将自己的藏书翻刻变成普及书籍。明清时苏州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书籍商品流通市场中心的主要原因是它有着众多的藏书家和发达的刻书事业。

由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藏书家队伍庞大,藏书者对各类文献的收藏需求极为庞大,这为商业性刻书提供了巨大的潜在销售市场和盈利空间。一些兼有书商与藏书家身份的巨富从中看到了巨大商机,他们充分利用收罗的大量珍稀藏书积极开展图书的商业化运作。因此,开设书坊经营刻书是他们重要的文化经济活动。而明清时江南经济繁荣,富商大贾甚多,为开设书坊经营刻书或自家刻书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条件。如明人叶盛、范钦、茅坤、毛晋、清人丁丙、鲍廷博、马氏兄弟、阮元、凌廷堪、闵齐伋等无不热衷此道。这些藏书家与书商的刻书活动成为当时城市学术与文化生产、传播的重要方式。藏书的商品化与普及刊刻,不仅为经营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有利于城市文化水准的提高,对江南社会的知识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收藏与刊刻的不断互动,既扩大和加速了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流通和扩散,也加速了江南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播。

除了私人藏刻书以外,官府刻书在江南城市文化的生产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这里还需略要涉及。明清时,江南各地不仅私人书坊刻书活跃,各地的官府机构也非常积极。例如当时刻书只属于中游的浙江,官刻却很盛,无论浙江省级官署还是府、州、县各衙署均有刻书^{[18]113},故刻印的数目十分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明前、中期的浙江省级官方机构浙江布政司、浙江按察使司、巡抚都察院及两浙送司和各地州府、衙署所刻书总数达175种^{[15]662-663}。又如明代苏州一府在万历初以前所刻书竟多至177种,为全国各府之冠,所刻之书由于质量上乘而被称“苏板”,与内府板、福建本并称^{[19]368}。

在刻书的内容上,明清有一个特点是官刻注重经史典籍,私刻注重名家诗文,商业性的书坊除经史读本和诗文以外,则更偏向于满足民间文化生活需要的小说、戏曲、酬世便览、百科全书之类的刊刻^{[20]94},故三类刻书的侧重点往往不同。官刻偏重于经史典籍,一方面是出于国家对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正面宣传和控制的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要满足国家行政管理储存历史参考资料所需,以及满足地方文化教育

机构的藏书及士子学习资料所需,如南京国子监刻有《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典》等。此外,官府刻印经史典籍具有其特殊优势,使大部头、所需昂贵的文献刻印能够得到质量保证。例如清末的浙江书局的编纂、校勘队伍,集中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和文学俊彦、学界名宿,其所刻之书皆为精善之作,为海内所赞赏。如浙江书局刊印的《二十二子》被认为是子书丛刻中最善的本子,由于是精选善本、精校重刻、印刷精美,而被后代藏家视作珍逾宋元的珍品^{[18]420}。又如浙江书局曾与江南书局、淮南书局、湖北书局通力合作刻成《廿四史》,这是任何一个书局都无力完成的艰巨任务。可见,官刻在大型珍贵文献的刊刻上具有特殊优势,也有利于文化学术的推广、文献的保存流传,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如浙江书局对乾隆时辑成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翻刻,对于这两者的广泛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经史典籍外,江南各地官刻还大量刊刻有益于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的政令、地理、名人文集及医书、日用文册等各类书籍,也有利于地方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尤其各地官刻对于地方志书和乡贤先哲著作的刊刻,对推进地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明清浙江各类官署曾立足本地、立足浙江,刊刻了一大批地方志书和乡贤遗著,如杭州府刻有《武林旧事》《西湖游览志》《杭州府志》《杭州府水利图说》《林和靖诗》《刘伯温文集》《宋学士文萃》等,嘉兴府刻有《愧刻录》《越绝书》等,湖州府刻有《吴兴志》和赵孟頫的《赵松雪文集》等,宁波府刻有《宁波府志》《奉化志》《四明文献志》和袁楠的《清容居士文集》等,台州府刻有《临海志》和戴复古的《戴石屏诗》等,金华府刻有《金华文统》和宋濂的《宋学士文粹》,等等。地方官刻重视地方乡贤、先哲著作和本地志书,这对保存地方文献的作用很大,而这种立足地方特色的刊刻路径,也是显示地方文化特色的一种方式^{[15]664}。

3 通俗文艺的刊印与市民文化的生产消费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艺创作繁荣,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并形成系列,如红楼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三国系列,以及志怪小说、武侠、才子佳人小说系列等。市民阶层的发展又推动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的蓬勃发展。在通俗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上,作家与市民读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而此时江南书商刻书热衷于戏曲、传奇、小说、诗词、杂书等图书的刊刻。如明人叶盛^{[21]213-214}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这一现象既充分反映了当时江南社会图书刊刻的商业化大潮,也鲜明体现了明清时期刻书业在江南市民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与关系。

3.1 迎合市民读者的喜好

书商为迎合读者的喜好,大量刊刻戏曲、小说、传奇等文艺作品,目的虽然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但客观上也为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阅读文本,扩大了通俗文化作品的消费与传播。如明代南京私人书坊刊行的光戏曲类就多达二三百种,其中唐对溪的富春堂曾刊行百种,至今还有《管鲍分金记》《三顾草庐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等约30种流存。小说的刊刻更为兴旺,每家书坊都争相刊刻,有一家刊刻多种的,更有多家争刻同一部小说的,如《西游记》一书,荣寿堂、世德堂等许多书坊都有不同刊本。书商为争夺市场而大力刊行这类通俗性的文艺作品,一方面满足了市民阶层对此类作品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其刊刻品种的丰富又为市民阶层的阅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例如金陵刻印的小说为与建阳小说上图下文的刻印方式相区别,而采取整版大幅的方式插于每回之前,并且更注重了人物与环境的刻画。又如金陵世德堂万历十九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区别与之前市场上的同本小说,在此刊本中增加了关索故事;又如万历二十年建阳余象斗所刊的《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为了吸引市场又改为花关索的故事,各自所刻都有所不同。

3.2 重视质量与审美设计

书商重视通俗性文艺作品的图书质量与审美设计,对提高市民读者审美和知识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如金陵著名的私人书坊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广庆堂、文林阁、陈氏继志斋等都曾大量印行有精美插

图的小说、剧本、传奇。对于这一点,明人谢肇淛^{[22]382}对吴兴凌氏刻书弊病的批评就可以印证,他说:“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慳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谢氏对书商殚精竭虑做好通俗性文艺作品的行为不予理解的看法,实际上是脱离了市场本身来看刻书业问题的。其实对通俗小说这类书籍采取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之阅读是有较大帮助的^[23]。通俗性文艺性图书以高质量的编辑、校勘,以及精美的印刷、装帧和配图出现在市场上,对市民阶层读者的影响绝不只是消遣性的谈资,也是隐性的审美熏陶和文化知识普及。此外,以建阳书商为代表的一部分书商为射利而粗制滥造通俗小说、戏曲等书籍也遭到谢肇淛的强烈批评,但“这种经营方针和上图下文插图方式的选择目的是一致的,即面对的是文化层次较低、购买力较差的一部分读者”^[23]。文化水平低,经济能力弱,并不等于就没有文化消费的需要,书商以低劣、粗糙的生产质量制造低廉的通俗小说等文化读物,恰恰满足了下层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因而这种极端粗劣的出版物,总是会有它存在的市场,也充分说明了通俗小说的大众化品格。

3.3 引导消费趣味的变化

从通俗性文艺作品的刊刻方向与内容看,既反映了江南社会市民文化消费的需求,也引导了市民文化消费趣味的变化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此类图书的大量刊刻出售,极大地推动和传播了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体系。明清时书商大量刊刻冯梦龙编辑的《绣像古今小说》、凌濛初编撰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白话短篇小说名著,以及其他著名戏曲、小说作品如《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坡书传》等,实际上是与当时小说创作的潮流转变相一致的,“在明嘉靖时期的传奇创作中,陡然崛起的政治斗争题材固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悲欢离合,儿女情长的传统主题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且,就其舞台性以及普及性而言,后者是占据主导地位”^{[24]696}。如果没有作者对市民兴趣的注意与顺应,在创作题材上的转变,从文学观念上进行新实践,也就没有具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社会思想的作品出现,自然也就不会引起书商、出版者的青睐。

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书商通过顺应市场需求千方百计大量刊印此类作品,为作家与读者建构起沟通互动的载体桥梁。通过它,作家的价值观可以影响读者,读者的趣味取向也会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学者程国赋在《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释》^[25]一文中指出:“作为古代小说传播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在明代书坊所刊小说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以市场、读者为出版导向的书坊与书坊主而言,读者阶层的喜欢、需求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编撰及刊刻。”同时,书商所采用的作品类型与价值取向,尤可左右时代的情感与世界观。如汤显祖与冯梦龙的新价值观思想的传播,就是显例。冯氏提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口号,编《山歌》《挂枝儿》等民歌集来宣传他的新价值观;汤显祖^{[26]1545}则主张“以情化人”,人责其戏曲通俗,“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氏答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陈继儒对此论深表赞同,说“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冯、汤二氏的思想与著作倘若离开书商的积极参与,他们的思想只会囿拘在有限的地域和阶层范围内。

此外,书商大量刊刻通俗性文艺作品对于新思想、新道德价值观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市民读者与通俗文艺作家之间新价值观的交流与互动,深刻影响了明清时代大众的感情世界与心态观念。虽然在通俗文艺读物中有很大大一部分是宣扬色情和消费欲望的作品,有些如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格调极为低下,但还是应该看到这种世情小说因为贴近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并且较多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有许多还是具有新时代精神和思想观念的。而一些具有鲜明意识的书商则进一步推动着城市文化精神向上发展。例如明代杭州文人型书坊主陆云龙就是代表,他不仅刻书精工、注重质量,而且在选题上具有鲜明的文人审美性和社会意义,而不是一味曲迎取悦读者。故他所刻的通俗小说,如自著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及其弟陆人龙所著的《型世言》和《辽海丹忠录》,都是借世俗的题材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和看法或对国事的关注和对传统道德的呼唤。因此,李泽厚先生在讲到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传奇

时,不仅指出其对近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巨大,更强调了它们有如《十日谈》之类的作品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长期封建儒学正统的思想禁锢,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27][171]}。读者通过接受此类作品,则可以陶冶性情,传播城市文明和思想,从精神结构上突破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的束缚,此类作品打破了人们固有的思想封闭,为城市文明形态的更新发展推开了新窗。

4 结 语

江南刻书业不仅在技术、市场与资本上都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开发的文化资源和对象上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发达的雕版印刷业,对江南丰富的文献积累和高质量学术著作的编辑刊刻,对于社会文化知识的保存与利用、传播及再生产都极有意义。同时,戏曲、小说、传奇等通俗文学作品是传播作者思想价值观念的重要介质。以戏曲、小说、传奇等通俗文学作品为主的城市文艺作品的刊刻,既适应了当时蓬勃兴起的市民文学发展趋势,又催生了新的城市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 叶梦得.石林燕语[M].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6(3):94-107,146.

[5] 陆容.菽园杂记[M].佚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常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常山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7]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 徐学林.试论徽州地区的古代刻书业[J].文献,1995,17(4):187-232.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41: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 孙从添.藏书纪要[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11]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序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13] 王西梅.乾嘉藏书家与吴派史学[J].图书馆学研究,1998,19(3):86-88.

[14] 李春光.黄丕烈和《士礼居丛书》[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13(1):40-42.

[15] 沈善洪.浙江文化史:下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6] 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前言[M].扬州:广陵书社,2003.

[17] 徐康.前尘梦影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

[19]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0] 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21] 叶盛.水东日记[M].魏忠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 谢肇淛.五杂俎: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3] 汪燕岗.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J].学术研究,2009(9):137-143.

[24] 史仲文.中国艺术史:戏曲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25] 程国赋.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释[J].文艺研究,2007,175(7):64-71,175.

[26] 汤显祖.汤显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7] 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